

探尋永續發展的公與義社會

◎劉兆漢（時報文教基金會董事、中研院院士）

一個公與義的社會，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，在其中，政府扮演的角色是努力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，然後根據這些制度去營造一個環境，以提供人民在物資上、精神上公

平、自主發展的機會。能達成這任務的政府，自然就是人民選擇的對象。這樣的理想，或許不是很容易達成，但絕對應該是我們努力的方向。

如何在台灣建造一個宏觀的公與義社會，我覺得我們的視野要廣、要深、也要遠，才有機會。首先，從廣的方面來說，目前全球化的浪潮，正聲勢浩大地洶湧而來，



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尤其大。就經濟方面，台灣以外貿導向，幾十年的努力，在資訊電子方面成為舉世有名的代工中心，我們的優勢是有優質而相對價廉的工程技術人力，所以在全球產業的分工鏈中，能佔一席之地，歐美先進國家的重要高科技製造業，許多都在台灣找代工或設廠，而他們則盡力於研究開發，主導一波波新產品的推出。

但是，台灣在代工方面的優勢，正漸漸的被其它一些較後進的國家挑戰，尤其是大陸以驚人的速度逐漸崛起，在許多製造代工項目中，已超過我們，這種趨勢，當然對台灣社會有極大的衝擊。

我們如何能在全球化的大潮流中，保持競爭優勢，對台灣社會的整體發展，將是一個關鍵性的因素，而大陸的崛起，可以看成危機，但也涵藏了許多潛勢的轉機。許多經濟學家都指出，台灣的資本及管理經驗，加上大陸的人力及市場，在全球化的過程中，合起來可共同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。如何安排兩岸關係，使台灣社會在與世界接軌時，享受到最大的效益，應該是我們要思考的最重要課程之一。

全球化對台灣社會還有更深一層的衝擊。在全球化的經濟中，所謂贏者圈的主人是能創新、願意冒險嘗試新事物的人，而我們的教育，是否能夠培養出這樣的人才呢？近十幾年來，台灣的高等教育，漸漸從菁英教育轉型為普及；全民教育水準的提昇，當然

是好事，可惜在量上面的大幅增加，卻直接影響質的提昇。例如，大學數目從六十所左右，增加到一六〇所上下，高教經費卻鮮有成長，結果是國立大學單位學生從教育部得到的支援大幅下滑，國內頂尖的大學在國際學術競賽中，逐漸喪失競爭能力。

在知識經濟掛帥的全球化趨勢下，沒有一流的大學來培育有創新能力的人才，台灣將永遠無法從代工的格局，晉升進入贏者圈內，所以我國高等教育需要嚴肅的思考如何來因應這種新局面。各大學應根據自己的優勢及特色，訂定辦學的願景，各自朝向自己的目標努力，追求卓越：研究卓越的大學，應努力在國際一流學術圈中爭一席之地；教學優越的大學，可致力培養各行各業的在地領導人才，這樣的分工，將能使教育經費更有效率的運用。另外，知識經濟下的職場，最需要的人才是能隨時吸取新知的工作者，我們的社會應該開發終身學習的環境，提供人民自動進修的機會。

這種機會，對許多因全球化而使得本地工廠遷移所導致失業的工作者，十分重要，學到的新專長，讓他們可以有尊嚴的重返職場。任何一個公義的社會，首要的任務之一，就是要能夠照顧到社會上弱勢的人民。全球化的推動，使得貧富差異更為懸殊，多年來我們社會引以為傲的貧富差距指標，最近正快速的惡化，當務之急，是如何建立一個可長可久的社會安全網，讓真正有需要的人得到幫助。

更進一步，我想將我們的視野放得更遠，來看台灣要建造什麼樣的公與義的社會。一個社會的發展，不能只將目光放在自己生存的當代或下一代，同時也應該為未來世代的人民著想。人類從工業革命以來，追求經濟發展，以為自然界的資源是無窮無盡，可以由人類恣意揮霍，對地球環境的態度，也是以「人定勝天」為主軸，無顧於自然界可能對我們的反撲，因而，自然界的資源漸漸消耗殆盡，地球的環境也被破壞得無法復原，未來世代接受到這個地球時，他可能已經沒有機會去求發展了，這當然不是一個公與義的社會。

從台灣來看，這些浪費資源、破壞環境的情況，也是相當嚴重；讓情形更糟的是，在民主化的過程中，政客們為了選票，做出各種取悅民眾的承諾，而從來不談加稅、不談如何維持預算的平衡，其結果當然是非常嚴重的「債留子孫」，這絕對不是我們心目中的公義。我們的社會，應該是一個遵守世代公義的社會，當在求發展時，絕對不能損壞自然環境、天然生態及政經環境，而導致未來的世代，無法在台灣這塊土地上，尋求他們的發展。只有符合這種「永續發展」觀念的社會，才是真正公與義的社會。

最後，我想強調一點：建立一個公與義的社會，是要靠全民的努力。當大多數人都認同「分享」與「包容」的核心價值觀時，可長可久的公與義的社會，才有機會在台灣滋生出來。